

医学·人文

麻风：

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梁其姿/著
朱慧颖/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麻 风

——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梁其姿 著

朱慧颖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梁其姿著;朱慧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医学·人文)

ISBN 978-7-100-09725-3

I. ①麻… II. ①梁…②朱… III. ①麻风—医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R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609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责任编辑:杜 非

封面设计:郝永棋

版式设计:单佳佳

麻 风

——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梁其姿 著

朱慧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25-3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 42.00 元

致 谢

我对中国麻风病史以及麻风患者的兴趣,源自早先的慈善组织研究和对医学史不断滋长的好奇。对许多历史学者而言,这或许是个奇怪的主题,倘若没有朋友、同事的鼓励,我不可能完成此项研究计划。我要特别感谢费侠莉(Charlotte Further),这些年来她始终如一的支持与对我不同阶段的著作的评点,对本书的完成不可或缺。我也要感谢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为本书的最初几稿提出精辟建议,使我在修改中受益匪浅。

罗芙芸(Ruth Rogaski)对修订稿的精到评论也使我获益良多。2004年春,在我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访学期间及之后,正值本书撰写之始,我也受惠于艾尔曼(Benjamin Elman)、韩书瑞(Susan Naquin)、谢弗德(John Shepherd)和戴梅可(Michael Nylan)。特别感谢高彦颐(Dorothy Ko)在本书的内容和出版策略上给予我非常有益的建议,我也心怀感激,铭记同年与席文(Nathan Sivin)的交谈,在谈话中他指出了中国医学史的有关问题。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许多博学多识的同事的意见与批评中获益,他们是:林富士、萧璠、梁庚尧、李建民、蒋竹山、李贞德(Lee Jender)、李尚仁、雷祥麟、张谷铭以及其他人士——此处虽未列出名字,我却记得他们的帮助与慷慨。

这些年,我也在台湾以外的地方介绍我的研究:承蒙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盛情邀请,在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在萨班(Francoise Sabban),后来是伊莎贝尔(Isabelle Thireau)的指导之下,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中国中心。由备受尊敬的米歇尔(Michèle Pirazolli-T'

serstevens)组织的,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作的系列报告,尤其令我难忘。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学院研讨会上,帕特里斯(Patrice Bourdelais)允许我和欧洲学者交换意见,宣读发表在2003年他编辑的一个集子中的一篇论文。2002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有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历史学者参加的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结果,2003年,我的文章发表在了大陆最重要的史学期刊之一《历史研究》上。在美国,当我写书的念头初步成形时,费侠莉和韩嵩(Marta Hanson)给了我在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介绍我的想法的机会。

撰书计划开始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巴斯德学院的报告对一些问题的概念化有很大帮助。感谢我的好友夏伯嘉(Ronnie Hsia)、罗威廉(William T. Rowe)、罗伯特(Robert Martin)和凯瑟琳(Katherine Martin)的邀请与盛情款待。应艾尔曼(Benjamin Elman)、脇村孝平和饭岛涉之邀,我也有幸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大阪市立大学介绍我比较成熟的著作的部分内容。

在研究的不同阶段,朋友和同事为我提供了与该主题有关的宝贵资料与信息。2005年夏,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的江澄医生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他在中国麻风病控制领域数十年的工作,以及他费尽心血收集的麻风病文献资料,使他在此问题上极有发言权。也正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事,我才得以参观浙江省的两个麻风院。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郑金生医生,多年来帮我解决传统中文文献问题。我也永远不会忘记,2002年夏他安排我在友谊医院对李桓英医生,一位富有魅力的中国麻风病专家做了鼓舞人心的访谈。

李玉尚以惊人的效率为我在上海、山东、云南、江苏和浙江的档案馆收集资料。在研究的最后阶段在广州逗留期间,吴滔热情地帮助了我。夏伯嘉和李毓中为我提供了有趣的16及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的资料(常常带有译文)。刘铮云、定宜庄和赖慧敏提醒我关注很有意思的中国皇室档案文件,魏丕信、张嘉凤和马泰来(Ma Tai-loi)则为我指出特殊的文本。王文基让我看他的麻风救济会(Mission to Lepers)的精彩资料,莎

拉(Sarah Elman)和艾米(Amy Leung)为我从耶鲁和香港的图书馆复印有用的资料。我也从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Staden)、安娜瑞丝(Amneris Roselli)和兹斐(Tzvi Abusch)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早期希腊、巴比伦医学与文本的知识。

本书参考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于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外交部、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广州市档案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民国藏书、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及其大学服务中心,那里保存了数量可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之后的资料),香港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图书馆的藏书、档案和数据库。我非常感激这些机构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提供的专业帮助。

在我研究的不同阶段,黄靖君、林芳如、黄珍珠、白宜君、林诚婷、卢索菲帮我借书、复印、归档。她们青春的热情总是照亮我的生活。

魏德海学院(Weatherhead Institute)的马奇(Madge Huntington)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安妮(Anne Routon)以良好的幽默感和令人赞叹的耐心,协助我完成了此书出版最后阶段的事务。迈克尔(Michael Ashby)以性情温厚的专业文字编辑的精准和勤勉,校正、改善了我的书稿。在出版过程中,莱斯利(Leslie Kriesel)处理了所有的技术难题。

此计划获得了中国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央”研究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学院的研究资助。

我尤其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这些年来,他们宽宏大量地忍受我不理喻地痴迷于一个又一个古怪的主题。

中文版序

疾病与人类历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坊间可见林林总总有关疾病历史的书籍——有描述疾病如何肆虐人类社会者,或宣扬疾病如何被人类消灭者——多单线看待疾病与人的零和关系,而忽视了疾病实为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把疾病放在中心位置来书写历史的两位西方学者,因而建立了影响深远的范式:一是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瘟疫与人》。这本小书以利落简明的手法探索各种细菌、病毒、传染病与人类社会的并存之道,以及大型疫疾的传播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一是傅柯(Michel Foucault),他从制度面剖析西方社会如何把麻风、鼠疫、癫狂患者以不同方式隔离于社会的过程,并从中窥见西方社会步往近代文明的主要核心动力与政治权力本质上的变化,即他所称的生物权力(biopower)的发展与茁壮。麦克尼尔巧妙地结合生物科学知识与世界史的关怀创造了人与疾病“相依为命”的历史书写典范。2003年“非典”一疫让世人重读他这本经典之作,并在其中找到新的意义。傅柯则从疾病管理制度的重大演变探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过程中的核心价值变化,为西方近代文明史立下重要的理论。

这两个范式给予本书写作的灵感。麻风病史里的生物面与社会面无论在史料上或叙述上均为丰富题材,而且可以在很长的中国历史论述中铺陈。其中的变与不变,能与大历史互相呼应。本书虽然涵盖上古至1980年代,但特别强调宋元、明清、近代三个重要历史转折期。在这三个重要的历史变化时期,不论是传统医学对麻风病的解释,或社会对麻风病患的想象与态度,或处理病患的法律或制度等都有关键的变化,呼应着这几个重要历史转折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发展特色。

同时,麻风病又是具普世性的疾病。世界范围内的古今文明均拥有处理麻风病患的历史经验。有关麻风病的西方史著可谓汗牛充栋。先是由于麻风病在基督宗教教义中有特殊意义,有关教会与欧洲各地讨论、处理麻风病患的文书档案相当多,特别是中古时期麻风隔离病院的各类资料。欧洲学者对这些隔离政策的目的与效果、教会对病患的真正态度等问题,至今仍争辩不休。麻风病史无疑是最能说明宗教、身体与疾病间密切而丰富的关系的跨领域课题。其后,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让西人重新注意渐在欧洲消失的麻风。西方人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殖民地重新发现这个古老疾病,麻风杆菌也在1873年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被看见。杆菌的发现,在生物医学上证明了麻风为传染病的看法。随即引起一场全球性恐慌:一些西方人认为麻风瘟疫会随时席卷全世界。近代日本为了要消灭这个有辱国体的、代表落后种族的疾病,不惜以其强大的国力限制全国麻风病人的行动。而华人就被指认为是这场世界性瘟疫主要的带菌传播者。这个指控当然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华人劳工移民世界各地有关。殖民地经验让当时西方医学专家把麻风与有色人种(或曰落后种族)的体质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麻风病也因而深化了19世纪的种族主义的生物面。如此这般,西方与中国麻风的历史在殖民时代同时进入世界史的洪流。后殖民时代西方麻风史的著作多对这一段近代西方种族主义,以及对待病患的不人道隔离政策做出自我批判。同样地,日本政界与学界也对近代政府对麻风病患的强制措施做出了反省。

中国今天应如何反思与论述麻风病一千多年的历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对西方强权的入侵与随之而来的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科学的强势挑战,顿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大国的自信。有识之士多透过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种种落后与腐败。其中麻风病的流行也被认为是华人种族质量低劣的表征。社会对待病患的方式多充满语言、行动暴力与歧视。除了一两位麻风专家花了功夫找到一些疑染麻风病的“历史名人”外,几乎没有人对这个疾病的历史有兴趣。这个历史失忆,

让麻风病的论述不得不以西方历史与生物医学的论述为基础。例如自宋元以来从南亚与东南亚输入的大枫子已是用来治癫痫的药物的这个事实,已很少被提起,公众总以为这个药物是由西方引入的新药。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在近代以前的外贸史、医疗史、宗教史、社会史被一笔勾销。至于中国历史里社会如何解释、治疗这个疾病?如何对待病患?近代麻风概念如何构成等问题,就更引不起国人的兴趣了。我想,重新发掘中国麻风史的理由之一,就是把这段历史回归中国的医疗、宗教、社会与政治脉络。因为西方中心的论述永远无法让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古老疾病在中国的意义。同时,中国文明的对谈者不能只有西方,还应包括与中国接邻的亚洲各区域。

这段历史失忆或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史研究至今仍未重视历史里的生物面,传统史学仍然将人的身体、疾病、老化、死亡等生物现象,视为琐碎而无关历史的问题。有关历史中生物面的研究多在医疗史这个专门范围内展开,也因而有所限制。近年学者基于医疗史前辈如谢利恒、范行准、陈邦贤等的研究,开始关注历史里传统医学知识所透露的身体概念的变化。而更瞩目的是近年宗教史,特别是道教史,与性别史方面研究对疾病观、身体观等问题所产生的极大影响。^① 这些尚在中国史领域边陲的研究取向,能从不同角度同时顾及历史中人群生活的生物面与社会文化面,其成果对广义的医疗史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这类研究虽然仍在初步的阶段,但其潜力无穷。本书的构想与写作,受益于上述的取向与成果甚多。我同时重视历代医书(包括涉及医疗的宗教书籍)里有关麻风的讨论(即疾病的生物性),与社会处理病患的法律与制度,尝试找出两者的历史关系。中国历代社会对麻风的讨论与处理策略自有其

① 如司马虚 Michel Strickmann 的遗著 *Chinese Magical Medici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 有关中国妇科史的 *A Flourishing Y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中国台北联经,2008; 李贞德编《性别、身体与医疗》,中国台北联经,2008; 李建民编《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国台北联经,2008; 林富士编《疾病的历史》,中国台北联经,2011。

独特性,能显示中国社会的特色,其中区域性的差异,尤不容忽视。我特别尝试从一个极长时期的历史书写方式来突出麻风病在中国史里的复杂的、变化多端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以及近代中国麻风病患的命运的深远历史渊源。

作为麻风病历史的研究,本书只能算是一个开始。英文版发表后,得到学界不少的评论。且不提过誉者,其中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Arthur Kleinman)与莱因(Grace Rvan)的评论甚为中肯。他指出本书作为历史学著作,始终无法直接处理病患如何感受标签(stigma)与痛苦的一面。我所利用的历史文献,只允许研究者间接地分析这个问题。虽然在有关明清一章中,我写了麻风病患利用其躯体的残障丑陋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并非只是被动的可怜受害人。但这始终是文人笔下的描述,不是出自病患之口的话语。有关疾病史的研究的确需要更多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理论分析。

2005年夏天我随着南京中国疾控中心的江澄医师访问杭州武康与萧山的麻风院,让我能直接与病患交谈,并亲自了解两院的历史,但毕竟时间太短,无法深入。本书英文版出版后,在2009年秋天,江澄医师又带着我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博士刘绍华参访几个民国时期在广东省建立的麻风村,包括江门崖西与西江口大衮岛的由外国教会创立的麻风村。其中成立于1917年的大衮岛麻风村尤令人难忘。我们在风雨中乘坐快艇从江门农村一个小码头启程,历四十五分钟风浪才到达这个至今仍非常荒凉的小岛。下艇后先被有鲜明殖民地优雅建筑风格的村舍吸引,然而回望凄风惨雨中一片无际的汪洋,忽然体会上世纪初被送此处的病患所感受的与世隔绝的悲凉。在岛上住了超过大半世纪的几十位长期病患,有的寄情宗教,有的以随遇而安的心境面对生活、自我管理。他们以锣鼓与笑脸欢迎我们几个稀客,以闲话家常的语调细诉他们被家人放弃的经历。我当时想,如果要重新写一本麻风史书的话,我一定要从这些病患的口述中进一步了解上世纪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包括病患对这个病的解释,与他们从发病到长期被隔离的遭遇与心路历程。

这些病患在我们访问后不久被重新安置在东莞的新式疗养院。对他们来说,这是再进入社会的新生活的开始。然而,近百年的大衮岛麻风村从此完全走进历史。

根据资料,目前中国仍有几百个麻风村。中央的、地方的档案馆仍藏有丰富的关于近代麻风病控制的数据。这些材料足够让年青一代的人类学者或历史学者更深入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麻风史,或透过麻风史的研究重新检视中国近世与近代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史。更好地响应凯博文所提出的挑战。刘绍华博士曾告诉我,比起中国西南部偏僻山区的麻风病患,大衮岛的长者算是幸运的一群。她的经验清楚地显示,中国的麻风史不只一个。同时,中国麻风史仍在延续着。

近年有关麻风病的科学研究指出这个病的历史与人类几乎同样长久,它是经由一个基因结构非常稳定的杆菌随着人类在地球上的徙移而传播。由于人群在全球各地的迁徙史悠久而复杂,麻风病在各地发展的历史也先后有别,科学家可以从基因结构的微变辨别历史的大概。^① 同时,由于这个杆菌不能在人体外培植,因此至今人类仍无法制造疫苗来预防麻风。换言之,就算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普遍推行有效的联合化疗,只要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麻风病就不会消失,尽管杆菌的传染性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强。今天在印度、巴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一些非洲地区,麻风病仍然猖獗。全球每年仍有约二十五万个病患。在巴西,一般人对麻风的恐惧比艾滋病尤甚。科学家还在继续研究杆菌的基因结构,与控制这个疾病的各种药物。今年2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个由美国研发、在巴西登记的新的麻风测试剂上市的消息。这个代价不到一美元的测试剂可以在十分钟内检验出病人血液中是否有杆菌,以便作早期的治疗以达到最好的疗效。^② 这个科学的新发明,对病患而言,

① Monot, M. 等, "On the Origin of Leprosy", *Science* 308 (2005 五月):1040-1042.

② Donald McNeil, "Fast new test could find leprosy before damage is lasti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13

无疑是好消息。不过,我们知道,一个药物能否有效控制疫情,并不单单依靠其药效,更重要的是医药制度的安排与效率。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如果病患因疑惧而逃避诊断与治疗,或社会因歧视而将患者驱赶于家庭与小区之外,或政府政策无法下行到基层,或基层的想法与经验无法上达,那么这个良药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在官方制度之外,还有宗教或公益团体不但可以提供病患所需要的精神慰藉,而且可以扮演施派药物的角色,那么药物的效用就会得到好的发挥。这些变数因不同宗教、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政治形态而产生极不同的结果。

既然人类社会注定要与麻风病共存亡,这个长期处于生物与社会文化面之间的疾病,或其他类似的疾病,应是以后历史学者继续关心的研究课题。

梁其姿

2013年3月4日于香港大学

目 录

致 谢.....1

中文版序 梁其姿.....1

导言.....1

第一章 疔/癩/大风/麻风:疾病/类别概念的演变史.....22

 疾病类别的病因学史.....24

 疗法.....62

第二章 被诅咒却可救赎的身体.....72

 法律定罪:人类对天刑的反应.....74

 宗教传统中的疔/癩病人:被诅咒却可救赎.....80

第三章 具传染性的病体:明清时代的麻风隔离.....102

 传染与不道德.....103

 明清时期的麻风院.....114

 作为病因与疗法的性行为.....136

 驯化野蛮的身体与救国.....148

第四章 中国麻风病人与现代世界.....157

 有传染性的可耻身体.....161

重塑国体:隔离.....	188
--------------	-----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麻风病.....218

1950—1990 年代的发展概况.....	219
------------------------	-----

国家方针与地方政策.....	242
----------------	-----

未彻底征服的麻风病与遗留问题.....	255
---------------------	-----

结语 麻风、中国、世界.....265

附录.....	275
---------	-----

参考文献.....	282
-----------	-----

索引.....	305
---------	-----

译后记 朱慧颖.....	336
--------------	-----

交织在一起。

最后，通过将前近代与近代、地方与全球相联系，本书展示了中国经验在疾病史、公共卫生史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生物医学的权力制度在全世界的延展过程。和作为地方病的麻风病有关的社会和文化形态是中国特有的，关于麻风病的历史记录尤其丰富详细。甚至在传教士和殖民者将 19 世纪的科学引进到中国之后，考量此一神秘而可怕、被认为自远古以来一直困扰着此古老文明的疾病的传统方法，仍然形塑着应对麻风病的策略。麻风病在殖民主义和日益受生物学支配的全球公共卫生运动的背景下出现时，此特定的历史反过来又决定了 19 世纪晚期中国人对麻风病引起的健康危机的应对。这是一段揭示面对膨胀中的西方科学和医学霸权，中国人如何认识与试图控制麻风病的历史。当现代的故事将批评的眼光投向作为权力制度的公共卫生运动时，中国与麻风的诅咒交战，也表明了竭力洗刷将麻风病等同于落后的污名的社会中，“卫生所彰显的现代性”对于精英的诱惑力。

在我讲述中国的麻风病故事之前，或许应该简要地叙述一下西方对麻风病历史的看法，因为它是关于此疾最有影响的话语。犹太—基督教对麻风病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利未记》的影响，该书声称麻风病患应该送到“营外”，因为他们不洁净，必须独居。在此基础上，1179 年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下令将麻风病患者和社会上的其他人隔离开来。自那之后，宗教宣布麻风病患为活死人，剥夺其所有世俗权利之举，在西方人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2 和 13 世纪整个欧洲麻风病院之多，使人们相信疫情严重，普遍害怕被感染。最近有学

制的机构。14 世纪之后麻风患病率的下降，不再被认为是隔离的结果，而是因为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以及更好的诊断技术能够区分真麻风和各种皮肤病。^①

麻风的“消失”在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疯人院的经典分析中成为了焦点，他认为疯人院取代中世纪的麻风院标志着欧洲的现代性。麻风病的减少或消失对福柯而言意味着中世纪的终结，对许多古典的历史学者来说亦是如此，不过他们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埃德蒙（Rod Edmond）最近修正了此观点，认为它夸大其词，指出麻风病在现代欧洲一直存在，在殖民时期的西方医学话语和文学表达中，“犹太—基督教对麻风病的反应中内在的深刻的矛盾心理”屡有表现。^②

正如在犹太—基督教文明中，中国的麻风病在漫长的宗教和医学传统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殖民地时期与西方令人丧气的交接中，中国也发现麻风病问题是国家艰难走向现代性的有力隐喻。

传统中国的麻风病

正如在西方，麻风病在中国也有漫长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医书和民间传统对它有不同的解释与认识。1970 年代之前，人们一直相信，麻风病是大多数古代文明，包括埃及、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都

① F. -O. Touati, *Maladie et société au Moyen Age: La Lèpre, les lépreux et les léproseries dans la province ecclésiastique de Sens jusqu'au milieu du XIV^e siècle* (Paris: DeBoeck University, 1998); F. -O. Touati, "Historiciser la notion de contagion: L'exemple de la lèpre dans les sociétés médiévales," in *Air, miasmes et contagion: Les épidémies dans l'Antiquité et au Moyen Age*, ed. Sylvie Bazin-Tacchella, Danielle Quérue, and Evelyne Samama, 157—187 (Langres, Fr.: Dominique Guéniot, 2001); F. Bériac, *Des lépreux aux cagots: Recherches sur les sociétés marginales en Aquitaine médiévale* (Bordeaux: 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 1990); Carole Rawcliffe, *Leprosy in Medieval England* (Suffolk, U. K.: Boydell Press, 2006) .

② R. Edmond, *Leprosy and Empire: A Med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记录过的古老疾病。^① 许多中国医学史家，包括 1960 年代的鲁桂珍和李约瑟，根据编于公元前 2 世纪的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断定麻风病，那时叫做疔/癩或者大风，见于古代中国。然而，这样的断言早在 1970 年代受到了质疑。^② 显然，古老的医学经典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学名著中的证据并不完全支持古代中国有真麻风的假说。1970 年代中期的考古发现中有一份法律文件，它被认为编写于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217 年之间，里面描述了一种出现令人联想到麻风病的症状、叫做“疔”的疾病。^③ 但是，尽管有如此重要的发现，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此说法，即中国古代文本中描述的“疔”（在古代中国亦读作“癩”）或“大风”，指的是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汉森氏病（Hansen's disease）或真麻风完全一致的某个特定疾病。或许可以说，这些古老的词语包括了有各种皮肤症状的疾病，其中一些和麻风病的症状极为相似。古代中国真麻风的确认问题，和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类似。麻风病在很长时期内和犹太—基督教世界所谓的 *sāra'at* 联系在一起，《利未记》著名的第十三章提到了它，致使麻风病在基督教西方被污名化达一千多年。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要么这些说法都是根据极不确定的证据，被认为指称麻风病的古称实际上包括各种类型的皮肤病，它们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某种麻风病，要么像 *saraat* 那样的词根本

① V. Moller-Christensen, "Evidence of Leprosy in Earlier Peoples," in *Diseases in Antiquity*, ed. D. Brothwell and A. T. Sandison, 295—306 (Springfield, Ill.: Thomas, 1967); G. D. Lu and J. Needham, "Records of Diseases in Ancient China," in *ibid.*, 222—237; J. K. Kinnier Wilson, "Lepros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Revue d'assyriologie* 60, no. 1 (1966): 47—58.

② A. Nakayama and N. Sivin, *Chinese Science: Explorations in an Ancient Trad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3), 306.

③ K. McLeod and R. Yates, "Forms of Ch'in Law;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Feng-chen shi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 no. 1 (1981): 152—153. 在 *Early China* (3 [1977]: 104) 中有 Donald. Harper 尝试性的未加注释的译文，见 Derk Bodde, "Forensic Medicine in Pre-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2, no. 1 (1982): 9—14。对此文件中的描述的探讨，见第一章。